

一、麥都思傳

麥都思傳

1.0 提要

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 1796-1857)，一個英國倫敦出生的印刷工人，當他二十歲的時候被派到南洋，追隨新教東傳的開拓者馬禮遜、米憐主掌教會印刷工作，然而却在東方發揮了高度的天才，不但成了傳教士，且精通馬來語、官話、廣東話、閩南話、上海話、日本話、寫成各種文字的文章。他編了好幾本字典(閩南語、官話、日語)，其中《福建方言字典》是有史以來第一本羅馬字閩南語字典，並且是西方人所著作的第一本除官話以外最大部頭的漢語方言字典。他和郭實獵修訂漢譯聖經，成了太平天國《欽定新·舊遺詔聖書》的底本。他也是第一個到上海開教的新教傳教士，並且也是第一個將聖經譯成上海話的人。他的大著：《China: Its State and Prospects》，將當時的中國風土文化簡介給西方人，其中有關第一代新教傳教士到東方開教的紀錄，成了研究十九世紀初期新教東傳史的重要文獻。本文以麥都思一生行儀、貢獻為主軸，兼及其前輩及子嗣，做為麥都思的小傳。

1.1 麥都思的先行者——馬禮遜、米憐

自 1580(明神宗萬曆八年)利瑪竇入華傳教以來，中國基督教界一直都是天主教的天下，至十九世紀末葉約三百年間，天主教吸收了約三百五十萬的「教民」。但基督教新教的傳入中國，則遲至 1807 年英國傳教士馬禮遜入華。

馬禮遜(Robert Morrison 1782-1834)出生於英國Northumberland一個削製鞋援的家庭，所以他長大以後也自然地成了一名鞋援匠。但是馬禮遜喜好讀書、篤信基督教。1801 年 19 歲起跟Rev.

W Laidler習拉丁文、希臘文、希伯來文，1803年1月7日入Hoxton Academy(今Highburg College)一年，又轉Missionary Academy at Gosport。當時英國、澳洲的新教各派爲了向東方傳教，已於1795年組成倫敦會(The London Mission Society)，1804年馬禮遜便向倫敦會申請來華傳教。1805年馬禮遜轉倫敦習醫學、天文學，經Moseley介紹向當時在英國的廣東人楊三德(Yong Sam Tak)習漢文。並請楊三德手抄大英博物館所藏1700年巴黎外方傳教士J. Basset所譯的漢文聖經四部福音書及保羅書信，以及拉丁文漢文字典手稿。1807年1月8日受倫敦會派爲牧師，月底赴美國，轉往中國傳教。

當時英國是世界最強大的帝國，殖民地遍及全世界，但英皇却禁止任何人利用英國船隻到亞洲或中國傳教。對中國的主要原因是清政府禁止中國人信仰基督教，天主教爲了在中國傳教，發生了無數教案，不幸事件連連發生，英國在中國最大的利益是販賣鴉片，英國政府不願意因爲傳教的關係，引起什麼教案來影響其鴉片貿易。

於是馬禮遜不得已轉向新教國美國，向當時的國務卿Mr. James Madison(1809年才當選總統)求助，乃得以搭乘美國輪船到中國來。1807年9月7日，馬禮遜抵廣州，是新教徒成功入華的第一人。但因清政府禁止外國人居住廣州，並禁止中國人教洋人中國話，馬禮遜乃轉澳門傳教。初時英國東印度公司得知馬禮遜的傳教事蹟，深恐影響中英關係，頗爲疑懼，但澳門支部却支持馬氏。1809年2月20日馬氏不但和當地一名英裔之女Morton小姐結婚，並在同日獲東印度公司聘爲翻譯。1817年甚至隨Lord Amherst赴北京任通譯，因不願向嘉慶皇帝下跪，無功而返。

馬禮遜入華之後勤於學習中國語文。1811年即完成《中國語文典》，次年出版。1813年完成漢譯新約聖經。同年他的得力助手米憐抵達澳門。但因爲天主教和中國政府的雙重壓迫，馬禮遜命米憐帶著剛出版的2000冊新約聖經和唯一的中國人信徒梁阿發前往南洋傳教。他自己則努力著述。1814年馬禮遜完成了第一本羅馬字官話

字典《華英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Vol. I) 三冊，1917 年出版，同年馬禮遜獲Glasgow大學神學博士學位。

1818 年馬禮遜在麻六甲創英華書院(Anglo-chinese College)，以米憐為第一任校長。

1819 年馬禮遜與米憐合譯完成舊約聖經。1823 年出版，共 21 冊，書名曰《神天聖書》。

1820 年馬禮遜出版《五車韻府》英譯本(A Dictionary of Chinese Language Vol. II) 二冊。

1821 年馬禮遜夫人死於霍亂。

1823 年馬禮遜出版《英華辭典》(A Dictionary of Chinese Language Vol. III) 二冊。

1827 年馬禮遜出版了第一本廣東話詞彙集《Vocabulary of the Canton Dialect》。

1840 年出版《English and Chinese Vocabulary, the Latter in the Canton Dialect》。

傳教、譯經、創校、著作官話、廣東話字典是馬禮遜一生中所做的開創性的事業。另外一件重大的文化事業是和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於 1831 年 5 月創刊The Chinese Repository月刊，這個月刊延續二十年，是早期新教在華活動及東方研究最重要的文獻。

1824 年 3 月 20 日馬禮遜回到英國，帶回一萬卷中國典籍，價值當時的英磅 2,000 磅。這批書後來遺贈給University College，其條件為必需設立中國語文系。同年 4 月謁見英皇George 4 世，11 月與Miss Armstrong再婚。這個再婚妻子是個非常有文才的女子，馬禮遜死後五年的 1859 年就替馬禮遜立傳，出版了《Memories of the life and labors of Robert Morrison D. D. F. R. S, & C.》

①。

1825 年馬禮遜在英國倫敦創Language Institution，次年回廣州，此後的餘年，都是以廣州為傳教中心。1834 年英國東印度公司解散，馬禮遜轉任英公使通譯。同年 8 月 1 日卒於廣州，8 月 5 日葬

澳門。

馬禮遜享年只有 52 歲，但他的事業比起利瑪竇來毫無遜色。他第一個到中國傳教、第一個開創現代化的中國人學校，第一個用羅馬字出版了漢語字典。他所採用的英式拼音法為麥都思等早期傳教士所沿用。後來到了 1842 年 Samuel W. Williams 才加以改為羅馬式②。馬禮遜死後新教傳教士為他設立馬禮遜教育會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 來紀念他，另外有商船命名馬禮遜號，也是為了紀念他。繼馬禮遜來華傳教的另一位倫敦會傳教士是米憐。

米憐 (William Milne 1785~1822) 生於英國 Aberdeenshire，只比馬禮遜小三歲。幼年窮困，被雇為牧羊童，12 歲立志傳教，入倫敦會的 Gosport 學校，1812 年 27 歲受命為牧師。是年九月入華，抵澳門，旋因天主教的壓力被葡萄牙總督驅逐。於是乘小船抵廣州，與馬禮遜會合。他在當地呆了五個月學會廣東話。

1813 年底奉馬禮遜之命赴南洋開教。南洋是英國、荷蘭的殖民地，那兒有大量的中國僑民，新教徒可以自由傳教，他們希望在那兒向中國僑民傳教，培養傳教人才，然後將基督的種子帶回中國傳播。

帶著二千冊新譯的新約聖經，一萬冊傳教小冊子，五千冊教義問答，米憐遊遍了南洋群島。1814 年 3 月 10 日米憐抵巴答維亞③。然後轉麻六甲，設印刷廠，印製傳教文書，並創刊 Chinese Magazine 和 Indo-Chinese Gleaner 雜誌。1818 年 11 月，馬禮遜花了 1500 磅在麻六甲創辦了「英華書院」(Anglo-Chinese College)，以米憐為首任校長。這個學校創立的目的是教導歐洲人中國話，教導中國人西方的科學與宗教④。整個創校計劃都由米憐執行。同年 (1818) 他獲得 Glasgow University 的博士學位。

自從加入馬禮遜的陣營之後，米憐便開始和馬禮遜合譯舊約聖經。1819 年舊約聖經合譯完成，在麻六甲出版。米憐所譯的部份為申命記、約書前記、士師記、撒母耳記、列王記、歷代志、以斯拉記、尼希米記、約伯記，均在馬氏的審查下譯成⑤。新舊約全書於米憐死後的第二年出版，共 21 卷，題為《神天聖書》。

1821 年米憐的健康大壞，同仁建議他回歐治療，但他急於完成舊約漢譯，又爲了探視育嬰院，在印度耽擱太久，以致無法醫治。1822 年初，他的身體極度惡化，乃回到新加坡、檳榔嶼，當他抵達麻六甲的第四天，即 6 月 2 日逝世。享年 37 歲，可謂英年早逝。遺著有：

《The Sacred Edict》London, 1817, 8 vo.

《A Retrospect of the First Ten Years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 to China》Malacca, 1820, 8 vo.

《Some Account of a Secret Association》這是 1825 年 2 月 5 日由馬禮遜在 Royal Asiatic Society 代唸的一篇論文。

1.2 麥都思的一生與傳教事業

麥都思 1796 年 4 月 29 日生在倫敦。父親 William Medhurst 是一名酒店老闆。根據註冊紀錄，他是 1807 年 11 歲入保羅學堂 St. Paul Cathedral School。1810 年 14 歲時輟學到 Gloucester 一家叫 Wood 的印刷廠當學徒，1816 年見倫敦會徵求派往麻六甲傳道地印刷廠擔任印刷工人的廣告，他去應徵，錄取了，立即被派往倫敦會所屬的 Hackney College 大學接受 Collison 博士幾個月的調教，學會中國的官話，稍作準備便上路了。

1816 年 9 月啓程前往麻六甲。1817 年 2 月 10 日船經印度馬德拉斯，停留了數月，他竟在這兒認識了一名叫 Elizabeth Martin 的未亡人，並且結婚。同年 6 月 12 日抵麻六甲⑥。

他一面在米憐的印刷廠擔任監督，同時努力學習馬來語和漢語，並且學會了傳道。1818 年開始學習閩南語，才學了一年，1819 年，麥都思便能以閩南語在麻城各地作每週四次的巡迴佈道了⑦。1819 年 4 月 27 日被米憐及其同工任命爲傳教士。他身材瘦峭，身體健康，意志堅強而個性豪爽⑧，並且具有極優秀的語言天才，因此他是一個天生的傳教士。

1820 年 Huttman 抵麻六甲接替麥都思管理印刷廠的工作⑨。此

後，麥都思一直在檳榔嶼、巴答維亞、新加坡、麻六甲、婆羅乃之間傳教。他曾在Parapattan設了一間育嬰院。

1834年馬禮遜死於廣州。1835年7月21日麥都思抵廣州，接替馬禮遜的傳教工作。他一方面要繼續為馬禮遜所聚合的一小群信徒傳教，並且沿著海岸，向中國異教徒散佈基督教的書籍^⑩。

但當時教禁未開，能夠進入內地的人只有商人和外交官。他親身體驗到在中國居留、傳教的困難。諸如：

1. 生活不便、當時清政府對廣州的外國僑民訂下種種禁令，諸如交易或雇傭需經洋行或買辦之手，得罪了買辦之後又幾乎不能找到新買辦，生活將陷於困境。這些買辦並且兼負監視任務，隨時監視洋人活動。外僑居留、行動限於極狹小的範圍。住屋包圍在骯髒的中國街道裏，街上擺地攤的中國人見了洋人都給白眼。唯一的快樂只有泛舟而已。但江上大船穿梭不停，稍一不慎可能會被撞沈。最令人不快的莫過於被中國人視為「番仔」。

2. 傳教受禁：傳揚基督教義及改信基督教為法律所禁止。

3. 語言困難：清政府禁止中國人傳授洋人漢語漢字，故洋人學漢語最方便的是到南洋去向華僑學。麥都思的《福建方言字典》在南洋完成，其理在此。

4. 禁止洋人出版中文書籍：洋人可以出版洋文書，不准出版中文書，漢字活字的取得也決不可能。因此唯一印刷的辦法是買通中國人代購活字，當然費用也特別高。若被發現，將被沒收或毀損^⑪。

5. 鴉片問題：麥都思抵廣州時正值鴉片戰爭前夕，中英關係因鴉片走私問題時起爭端，傳教士來往只有乘鴉片走私船，又因他們會說漢語，有時權充翻譯，因此傳教士往往被誤以為鴉片販子或其同路人。英國商人雖然對傳教士頗為尊重，但不容批評買賣鴉片的道德問題。傳教士的立場變得十分尷尬^⑫。

澳門的情形比廣州好得多，因為澳門為清、葡共管之地，當地的中國人對洋人比較習慣、清政府對新教的傳道也不太干涉，出版亦可自由，麥都思《福建方言字典》能在澳門出版即是一項證明。

為了和鴉片貿易劃清界線，麥都思企望得到一條傳道專用船。

他希望這條船不但可以使傳教士洗脫帝國主義販賣鴉片的罪惡，並且方便於巡迴中國海岸傳佈福音。船上可以設印刷機印製傳教文字，若有信徒受到迫害，可以叫他逃到船內加以保護，叫這些人幫忙印刷、裝訂、抄寫、通譯等。如有可能應該聘請一名虔誠的醫生。沿著海岸進行醫術傳教^⑬。麥都思在他的書中最後總結說：

「乘坐中國船可能有危險，乘鴉片走私船太矛盾，租船又太貴，唯一的選擇就是擁有一條傳教專用船。」^⑭

他的夢想終於實現了。有一些英美商人損贈給他購得一艘船，當作南洋群島的傳教專用船^⑮。另外，爲了中國沿海傳教的目的，1835年經美國實業家Oliphant的斡旋，募得500磅，租了一條船，專門航行於中國、越南、朝鮮、日本之間，期間一年^⑯。

1836年麥都思回到英國。他在那兒寫下他的名著：《China: Its State and Prospects》。1838年由倫敦John Snow出版。1973年由美國Delaware州Wilmington的Scholarly Resource Inc.翻印。

麥都思寫這本書的目的是讓西方人了解中國的歷史、地理、人口、政治、文化、語言、文字、文學、宗教以及天主教、基督教新教在中國傳教情形，尤其有一半以上的篇幅是在紀錄馬禮遜入華開教(1807)到麥都思回英以前(1835)新教發展的詳細過程。但是向祖國募集傳教資金，可能是這本書的實際目的，這點可以從書末的總結看得出來，他說：

「總之，我誠懇呼籲基督信衆，發揚你們的善心與奉獻精神。這件偉大的事業所需龐大的資金，需要大家慨伸援手。」^⑰

1838年麥都思帶著和他同名的小麥都思回到爪哇。這個孩子出生於米憐去世的1822年。長大以後送回英國唸書，今年已經16歲了。

1839年鴉片戰爭爆發。1842年7月14日訂下南京條約，開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五口通商，傳教空間突然擴大。麥都思捷足先登，1843年帶著小米憐入上海開教。他雖不是登陸上海的第一名歐洲人，却是第一名登陸上海的新教傳教士。也許資金相當充裕，麥都思很快的在同年就在上海購地建倫敦會教堂^⑱。從此以

後，他一直住在上海傳教，住了十四年，直到晚年身體惡化，1856年9月10日由上海啓程、準備回到英國休養。1857年元月21日船抵Southend，翌日抵倫敦已經不行了，1857年元月24日晚上逝世，元月31日葬於Abney Park Cemetery，享年60歲。後人爲紀念他，在上海設麥倫書院。

麥都思的著作甚豐，在他的名著《China: Its State and Prospects》卷末中附有他的著作目錄，在1836年以前；他的漢文著作共30篇，馬來文11篇。在逝世以前，共著漢文59種，馬來文6種(?)，英文27種^①。

從他著作的內容來看，除了衆多的傳教小冊子不計外，他的重要著作，主要是語言方面，尤其是編字典的貢獻最大，其次是譯經事業。神學方面的著作只有：

《Dissertation on the Theology of Chinese》(1847)

另外有一些討論馬來語如何翻譯“God”一詞的文章。

1.3 麥都思的譯經事業

基督教聖經是世界上發行人數最多，也是譯本最多的一本書。唐太宗貞觀九年(635)景教傳入中國，據景教遺著《尊經》所載，景教士共譯三十五篇經文爲漢文。可見聖經漢譯已有一千三百餘年歷史。

天主教雖於明代翻譯了一些傳教文字，但並未正式發表過聖經漢譯本。約在1700年巴黎外方傳教會教士巴設(J. Basset)才將四福音書，及保羅部份書信譯成中文，但未發表，原稿藏於倫敦大英博物館，謂之Sloane Manuscript。馬禮遜所見者即是此本。另十八世紀末耶穌教士賀清泰(L. de Poirot)亦漢譯了大部份的新約、舊約，但亦未發表，其原稿現存北堂圖書館。

新教比起天主教來更重視譯經。因爲他們認爲把聖經的道理準確地傳佈出去是最重要的傳道工作。他們不斷把聖經原文譯成新的語言，即使已有譯本，也不斷地新譯，以確保真正傳播聖經真義。

新教最初是1806年起浸禮會傳教士馬士曼(Dr. Joshua Mar-

shman)在印度漢譯聖經。1811年譯成新約，1822-23連同舊約發表。

就在同時稍後，1807年起馬禮遜便在中國著手於聖經漢譯，1810年就修訂巴設的使徒傳付梓。1811年發表路加福音、約翰福音，1813年新約全部譯成。1814年在廣州出版。米憐轉往南洋群島所攜帶的二千冊漢譯聖經即是這一批。

自此之後，米憐和馬禮遜合譯舊約。1819年完成，在麻六甲出版，1823年新舊約全書出版，共二十一卷，書名曰《神天聖書》。此書影響了馬禮遜的弟子梁阿發著成《勸世良言》，1836年洪秀全得讀此書，引起了信心，終鑄成基督教式的太平天國革命，是中國第一次宗教革命，始作俑者當為馬禮遜、米憐^{②0}。

聖經漢譯本繼續在修訂。第一次重譯由麥都思、郭實獵(Gützlaff)、裨治文(Bridgman)和小馬禮遜(John R. Morrison)合作。其中新約翻譯大部份由麥都思擔任，舊約則大部份出自郭實獵之手。新約聖經譯本於1835年完成，1836年由麥都思作最後修訂，1837年在巴答維亞出版，定名為《新詔遺書》，共327頁，是石印本。在此後的十幾年，這《新詔遺書》是新教的主要聖經譯本。1840年郭實獵又將此譯本稍作修改，重新出版，題為《救世主耶穌新詔遺書》。

舊約主要由郭實獵著手翻譯，但麥都思，裨治文、小馬禮遜都有幫忙。新版舊約約在1838-1840之間發行，計共665頁^{②1}。

太平天國在革命過程中，大英聖書公會曾募款助印聖經供其到處傳發。建國之後，癸好三(1853)年新刻新舊約聖經，分別叫做《欽定舊詔遺書》(舊約)、《欽定前詔遺書》(新約)。書名延用麥都思、郭實獵的譯本，其文字也大抵相同，只有少數修改。由此看來洪秀全想在中國建立一個基督教國家的太平天國革命之中，麥都思也間接插了一腿，至於郭實獵，更直接向洪秀全講過經。

1842年鴉片戰爭結束，訂南京條約、開五口通商。基督教得到了一些傳教的新天地。英國倫敦會、美國公理會、美國浸禮會於1843年8月中在香港會議，決定成立委員會重譯新約。麥都思、施敦力(Stronach)、布朗(Brown)、裨治文(Bridgman)、理雅各(James

Legge)、克陞存(M. S. Culbertson)、小米憐、小馬禮遜等被選為這個委員會的代表。但因意見不合，倫敦會的代表麥都思、施敦力、小米憐於 1851 年宣告退出。麥都思等人完成的新約全書「代表譯本」(Delegate Version) 1852 年出版。麥都思和理雅各合譯的舊約「代表譯本」亦於 1853 年完成，翌年出版，均由美國聖書公會印行。

以上的漢譯本所使用的都是文言文。1854 年起，麥都思和施敦力合作將之譯為南京官話。是新教所譯的第一本官話白話譯本。有人說這個譯本只是一個南京人將委託譯本譯成南京官話，其譯文不忠實於希臘原文^②。

另外 1847 年，麥都思曾將約翰福音譯成上海話。1848 年他的助手小米憐也將馬太福音譯成上海話^③。

麥都思自 1817 年入南洋傳教至 1857 年逝世，經過了四次聖經重譯工作，其中有兩次是漢文，一次南京官話、一次上海話。可以說，他大半生都在貢獻於聖經漢譯的工作。

1.4 麥都思的語言學成就

西方傳教士為了傳教的目的，一定要學習當地的語言，以便於溝通，其次為了自己學習的便利以及準確地傳達教義，必須將當地的語言文字化，以印製傳教小冊子或翻譯聖經。他們用來記述語言的工具，很自然地採用自己的文字——即羅馬字。這樣的工作，無意間便替各地的語言羅馬化了。這一套一套的羅馬字，後來往往變成原來沒有文字傳統的語言的正式文字，甚至原來雖有文字，因為殖民地的關係，改變其傳統文字而採用羅馬字，越南便是一例。中國原來就有一套傳統的漢字，羅馬字至今沒有取代漢字的文字地位，頂多只用作一種漢字的注音符號而已。但西方傳教士用羅馬字所做的字典、教本、譯文、傳教文字等，却成為研究近代漢語方言最寶貴的文獻資料。其中，麥都思是一個偉大的開拓者。

據文獻紀錄，漢語方言最早的一本羅馬字字典應是西班牙人於 1609 年所出版的《The Fokien Dialect Dictionary》(福建方言

字典)②④。

其次應屬馬禮遜的官話字典《華英字典》(3冊, 1817年)、《五車韻府》(2冊 1820年)、《英華字典》(2冊 1823年)和廣東話字典《Vocabulary of the Canton Dialect》(3卷 1827年)。

但 1609 年的西班牙文閩南語字典極為稀覯, 也看不到對後世有什麼影響, 麥都思的《福建方言字典》並未提到它。村上嘉英認為麥都思沒有機會見到這部字典②④。

馬禮遜是個了不起的語言學者, 他的官話字典確是破天荒的創舉。但他的廣東話字典却極為簡略。甚至連聲調都沒標示。因此如果不計官話字典, 麥都思可以算是近代漢語方言字典的開拓者。

麥都思開始學漢語是入華前一年的 1816 年②⑤, 1817 年 6 月他抵麻六甲, 一面從事印刷工作, 一面努力學習馬來語, 廣東話、閩南話。他在本國所學的是官話, 但他在南洋所接觸的中國人却幾乎沒有人會說官話。1818 年, 他開始學習南洋最通行的閩南語②⑥, 那正是謝秀嵐出版《彙集雅俗通十五音》的一年。這本十五音成為他的閩南語字典的範本, 必然在他學習閩南語的過程中發生了很重要的指導功能。第二年, 即 1919 年, 麥都思便能以閩南語在麻六甲各地作每週四次的巡迴佈道。1920 年他寫了一本小小的閩南語詞彙集, 發表在麻六甲, 1923 年他又把這個詞彙集擴充, 寄到新加坡, 準備由新加坡協會(Singapore Institution)資助出版。可是新加坡協會的事業並不順利。這本字典轉輾由麻六甲、檳榔嶼, 1829 年又原封不動地回到麥都思手中。在這段期間, 麥都思的閩南語進步了許多, 對原字典已不滿意, 但是英國東印度公司出版的編審委員會看中了這本字典, 答應出版。於是麥都思重新編輯, 增入數千個漢字, 達到 12,000 字左右, 並從古典名著中引用適當的名言作為主要字條的例句②⑦, 逐字注音, 譯為口語。

這本字典完成於 1831 年 7 月 29 日, 1831 年 7 月起開始排版②⑧, 但 1834 年 4 月排到 320 頁, 因英國東印度公司解散, 資金缺乏, 而被迫中止。1835 年麥都思到廣州接替馬禮遜的事業。他發了一些勸捐書募到一筆資金以完成印刷, 捐獻者多達百人。1837 年六月終

於完成排版^{②⑨}。

麥都思這部字典用現在的標準來看不是一本水準很高的字典，但它是目前所見最早的一本，也是筆者所知篇幅較大(共 930 頁)的一本羅馬字閩南語字典。這本字典根據十五音加以羅馬字音標化。其音標的詳細說明，在今日變成考證「十五音」音讀，亦即考證十九世紀初期的漳州音系最寶貴的文獻。其例句文白並譯，也是研究文白異讀的好文獻。

但閩南語並非麥都思唯一的專門，他的閩南語字典也不是他的第一本出版的字典。

1830 年麥都思就在巴答維亞出版了一本《An English and Japanese, Japanese and English Vocabulary》(英日、日英字彙)。石印本，八開 334 頁，二冊。

這本書所以稱為 Vocabulary(字彙)而不稱 dictionary(字典)，表明了它並不企圖收入所有字彙。並且編輯目的是趨向大眾化。作者希望不要嚴格要求它。

事實上麥都思從未到過日本，也不曾和日本人對話。石印的書寫者是一名既不懂日文亦不懂英文的中國人。雖然衛三畏說它「是一本非凡的書，決不是爛書」，筆者無緣看到這部字典，但猜想不可能好到那裏去。

麥都思為什麼會想到去編一本日語字彙呢？這是因為當時在南洋的傳教士預期日本幕府會很快地改變其鎖國政策，開放港口，容許外國人進入。這本字典即是迎接這個新時代、新情勢所做的準備工作之一^{③⑩}。

另外二本譯作，一是 1835 年所發表的：

《Translation of a comparative Vocabulary of the Chinese, Korean and Japanese》

一是 1840 年譯自 1650 年 Gilbertus Hapart 所著：

《Dictionary of the Favolang Dialect of the Formosan Language》

這是一本台灣平埔原住民族法波朗語的荷蘭文解釋的字典。

麥都思的馬來語應當是非常傑出的，1836 年以前，他用馬來文寫的傳教文字就有 11 篇之多，但沒有發現討論語言問題的作品。

1839 年他向 Chinese Repository 的編者演說：

《Remarks on the name of Jesus, as expressed in Malay》

全文轉載於 1843 年九月 Chinese Repository 卷 12:449-455。這篇文章討論到 Jesus 如何翻譯為馬來語的問題，兼論漢譯當以「耶穌」為佳。

40 年代以後，麥都思的寫作方向轉向官話和上海話。

1843 年麥都思在巴答維亞出版了：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華英字典)二卷八開 1600 頁。

如前所述，馬禮遜曾於 1817 年至 1823 年先後出版了三卷英華、華英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III)。但是誠如衛三畏所批評的，這本字典體例混亂，既不像字典，也不像字彙集，衛三畏說：「總之，博士這套傑出的字典，開頭像是百科全書(encyclopedia)，末尾像是拼字教材(spelling book)。」^{③①}

衛三畏(1843)接著對麥都思的《華英字典》簡介說：

「幾年前他列出了一個最常用三千字表。這是根據幾個最有名的中國作家的作品的用字出現頻率所做的統計，按其重要性加以排列。表中最前面的兩三百字，依辭典編纂法處理，提供給漢語學生最有價值的幫助。這樣的編法可以做無盡的補充，……所以編者適可而止。……每一個漢字最初標出官話音，然後幾種他所知道的各省方言。標方音同時標出文讀與白話兩種讀法，並且採用同樣的一套拼音法。破音字也正確的分辨出來。例句一定先標出讀書音，然後根據最熟練的先生譯為白話。每一個字附上同義字、反義字、和使用這個字的成語。」^{③②}

按照出現頻率選出常用字、同時標出方言、文讀音、白話音，同義字，反義字、片語，這樣細緻的辭典編纂法在中國是前所未有的，即使在今天，也沒有一個中國人再做出這樣細緻的常用字典。

同文(1843)也同時預告了麥都思漢語字典的第二部：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英華字典)

這本字典出版於1848年。

麥都思另外編了一本官話會話書，書名是：

《Chines Dialogues——questions, and familiar sentences, literally rendered into English, with a view to promote commercial intercourse, and to assist beginner in the language》

這本初級商用官話會話課本1844年上海初版。麥都思逝世之後，他的哲嗣小麥都思又加以增訂，1865年在上海再版。全書225頁，全文用麥都思一貫的拼音法逐字注音，只可惜不記聲調。

麥都思所記的官話並非北京官話，而是南京官話。這個官話保存一種喉塞音收尾的入聲，並且保存齊齒音ki, k'i, hi, 和tsi, ts'i, si, chi, ch'i, shi的對立。

1854年麥都思和施敦力開始將其代表譯本譯成南京官話，1857年1月21日麥都思逝世，同年這本南京官話聖經出版，可惜來不及做他臨終前最後的獻禮。

麥都思的晚年在上海渡過，我們不知道他是否著作了有關上海話的作品，但早在1847年他便曾經用上海話將約翰福音翻譯過一次。

麥都思也早在初抵南洋的時候就學會了廣東話。他在《福建方言字典》的序言中說，在南洋的福建人和廣東人彼此間也不能溝通。麥都思常常為這兩個相鄰省份的華僑充當翻譯^{③③}，可見他會說廣東話。

麥都思不但具有非凡的語言天才，並且是當代最偉大的語言學者。衛三畏在一篇評介裨治文所著《A Chinese Chrestomathy in the Canton Dialect》(1841)時簡介當時的漢學界說：

「在世的所有(西洋)漢學家之中沒有一個人比得上他(麥都思)。」^{③④}

至於馬禮遜只是一筆帶過。由我們看來，當時已死的前輩馬禮遜的語言學成就，其實遠不及麥都思，不論從質與量來看，從深度與廣度來看，都不妨做這樣的評判。所謂「前修未密，後出轉精」，

這其實是很自然的事。

可是麥都思的成就被他的先行者馬禮遜搶盡鋒頭，他的名字反而很少人知道。村上嘉英說：

「即使他的名字被馬禮遜的盛名所掩蓋，使得人們忘了他是個漢語語言學家，但是做為一個漢語方言學家，他的名字將永不磨滅。」

③⑤

麥都思的拼音方案大部份採用馬禮遜官話字典的英文式拼音方案，這套拼音方案最初為英語系傳教士所普遍採用來描寫各種漢語方言，Chinese Repository雜誌也採用它。但衛三畏自 1835 年 8 月起每年都發表論文提倡改為羅馬式拼音方案，1842 年他在 Chinese Repository雜誌發表〈New System of Orthography〉③⑥之後Chinese Repository便改用這套羅馬式拼音方案。後來打馬字(Talmage)羅啻(Doty)、杜嘉德(Douglas)、甘為霖(Campbell)都用羅馬式，遂成教會傳統，麥都思的拼音方案在今天乃變得令人十分陌生而怪異。但麥都思所創用的聲調符號，仍被上述諸家乃至今日教會所沿用，甚至假名拼音方案也加以沿用，他如潮州、客家方言字典也都採用作為調類符號，這套符號幾乎成為南方漢語方言的共同傳統，這可以說是麥都思對近代漢語方言羅馬字記述法最大的貢獻。

1.5 麥都思們的子嗣

倫敦會的三名最重要的中國傳教事業開拓者馬禮遜、米憐、麥都思，有幾個共同點：他們都是隻身來華，在東方結婚。在東方生子。他們都是以傳教事業為主，兼有漢學成就。

他們的子嗣也都是一些的共通點：他們都是在東方出生，回英國受教育，長大後再到中國，但不是為了傳教，他們主要以家傳的漢學淵源，擔任英國在華外交官的通譯，或成為外交官。

現在對倫敦會三名開拓者的子嗣作一簡介如下：

馬禮遜生了七個孩子，長子約翰馬禮遜(John Robert Mor-

rison 1814-1843)，在澳門出生。1830 年 16 歲即擔任英國廣州商社 (Canton Merchants) 通譯，馬禮遜死後至南京條約簽訂的八年內 (1834-1842)，他擔任英國政府的翻譯官兼中文秘書。當時中英外交交涉皆由其經手，1839 年中英鴉片戰爭的引爆者就是他。香港割英後，他任香港總督報行秘書。1843 年以瘧疾死於香港。他死去當時英國駐華全權大使璞鼎查 (Sir. Henry Pottinger) 稱之為「國殤」 (National Calamity)。遺著有《Chinese Commercial Guide》(1833)。

值得提醒的是，如前所述，約翰是麥都思《福建方言字典》在澳門排版時的校對。猜想大概 1834 年以前由馬禮遜校對，1834 年馬禮遜死後至 1837 年出版由約翰校對。

米憐的獨子查理米憐 (William Charles Milne 1815-1863) 是 1815 年米憐夫婦受馬禮遜之命轉移傳教陣地，由廣州赴麻六甲途中，轉輾於南洋群島之際在船上所生。稍長送回英國受教，1839 年 24 歲阿巴登大學畢業後，奉命來華傳教。同年 12 月 18 日由名傳教士理雅各 (Dr. James Legge) 帶回澳門，在馬禮遜教育會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s House) 當助手，幫麥都思重譯「代表譯本」聖經。1842 年起輾轉於定海、寧波、廣州之間，1843 年 8 月抵香港，陪麥都思前往上海開教。1857 年麥都思逝世，查理也開始轉業。1858 年他轉往福州擔任英國領事通譯。英法聯軍侵入北京直後的 1861 年昇任北京英國領事館秘書，英政府中國語通譯養成班主任。1863 年 5 月 15 日在北京逝世。

最後，麥都思的兒子小麥都思 (Sir Walter Henry Medhurst 1822-1885)，米憐逝世的那一年在巴答維亞出生。少年時代回英國求學，1839 年由其父携回中國。翌年 (1840) 任英國駐清貿易監督官隨從。初隨英國全權公使懿律 (Captain G. Elliot)，後隨新任公使璞鼎查 (Sir H. Pottinger)；1841 年鴉片戰爭中，曾參與佔領廈門及舟山之役，獲勳章；1841-42 任舟山英駐軍通譯；1843 年 10 月 7 日任上海領事館通譯，同年其父麥都思正好跟小米憐也抵達上海開教。1848 年任廈門代理領事；1850 年任香港駐清貿易監督官秘書；

1853 年任香港英國駐清貿易監督官事務總長；1854 年升福州領事，任中的 1857 年喪父；1858 年小米憐被提拔為福州領事館通譯，同年小麥都思轉任登州領事。此後二年，小麥都思都在上海福州兩地服臨時勤務；1864 年任漢口領事；1868 年奉派往上海處理揚州教會遭襲擊事件，曾向兩江總督曾國藩提出強硬抗議。1876 年 12 月退休。1877 年封爵(knighted)，小麥都思與其父姓名全同。唯一區別是小麥都思全名之前有個sir的頭銜，其理在此。1881 年小麥都思為籌備英國北婆羅乃公司(British North Borneo Company)而奔走籌劃。次年回中國招募勞工到北婆羅乃公司做工。1883 年起閒居香港十八個月，頻向當地報紙投稿。1884 年回英國。1885 年 12 月 26 日逝世於Torguay。

倫敦會派往中國傳教的三位傳教士馬禮遜、米憐、麥都思父子檔，只有麥都思父子幸能落葉歸根，死在祖國的土地上，其餘兩家父子都客死異鄉，死在中國，和他們的事業一起埋在人們的記憶之中。

1.6 註釋

- ①參照Memories of the life and labors of Robert Morrison D. D., F. R. S & C. 1839，節錄載 Chinese Repository 卷 10: 25-37, Jan. 1841。
- ②參見Samuel Wells Williams: 《New System of Orthography》Chinese Repository卷 11:28-44, Jan. 1842。
- ③參見Medhurst: 《China: Its State and Prospects》P.261。
- ④前書P.313。
- ⑤楊森富：《中國基督教史》P.376。
- ⑥溝口靖夫：《東洋文化史上の基督教》P.357。
- ⑦Medhurst前書P.314。
- ⑧George Smith：《The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P.202。

- ⑨Medhurst：前書P.314。
- ⑩Medhurst：前書P.283。
- ⑪Medhurst：前書P.283-294。又溝口：前書P.359-360。
- ⑫Medhurst：前書P.359-365。
- ⑬Medhurst：前書P.367-369。又溝口：前書P.360-361。
- ⑭Medhurst：前書P.575。
- ⑮溝口：前書P.361。
- ⑯Medhurst：前書P.575。
- ⑰Medhurst：前書P.576。
- ⑱比屋根安定：《支那基督教史》P.236。
- ⑲全上。所謂馬來文 6 種不知如何算法。依麥氏前書，1836 年以前已有 11 篇。何以一生只著 6 篇。
- ⑳楊森富：前書P.350-376。
- ㉑賈保羅：《聖經漢譯論文集》P.7。
- ㉒海恩波著陳翼經著：《基督與中華》P.81。
- ㉓本節主要參考楊森富：前書第十八章〈中華聖經翻譯史〉。
- ㉔參見村上嘉英：《W. H. Medhurst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nguistics》1965。
- ㉕參見E. C. Bridgman(裨治文)《A Chinese Chrestomathy in the Canton Dialect》1841 年出版於澳門，序文轉載於Chinese Repository Vol. XI, March 1842, P.159。
- ㉖Medhurst：《Dictionary of the Hok-Kèèn Dialect》前言，P.6。
- ㉗Medhurst：前書序言P.6-7。
- ㉘見Medhurst：Chinese Repository卷 6:143. July 1837，收錄麥都思《福建方言字典》的note.該note署年 1931 年 7 月 29 日，衛三畏序亦提到排版開始於 1831 年。
- ㉙S. Wells Williams(衛三畏)：麥都思《福建方言字典》序，P.3-4。
- ㉚S. Wells Williams(?)：1832 年 7 月份Chinese Repository卷

6:109-110, 有關麥都思《An English and Japanese, and Japanese and English Vocabulary》的簡介。

26 ③①參見 1843 年 9 月份 Chinese Repository 卷 12:497。

27 ③②前文：P.498。

28 ③③Medhurst：《A Dictionary of the Hok-Këen Dialect》P.2。

29 ③④參見 1842 年 3 月 Chinese Repository 卷 11:159 轉載。

30 ③⑤村上嘉英：《W. H. Medhurst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nguistics》Tenri Journal of Religion, Dec. 1965. 卷 7:63。

31 ③⑥Samuel Wells Williams：《New System of Orthography》Jan. 1842, Chinese Repository 卷 12:28-44。

參考書目

Chinese Repository (以下簡稱 C. R. 該雜誌大部份報導文章皆不署名，作者當為主編衛三畏 Samuel Wells Williams) 自 1832 年 5 月至 1851 年 8 月共發行 20 卷。

—— “Stud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C. R. 卷 7:113-121.

—— “A chinese Chrestomathy in the Canton Dialect, by E. C. Bridgman. Maccao, S. Wells Williams, 1841, Super-royal octavo, pp.728” C. R. 卷 11:157-161, March. 1842.

—— “英華韵府歷階 or An English and Chinese Vocabulary, in the court dialect, by S. Wells Williams. Printed at the Office of the Chinese Repository.” C. R. 卷 15:145-150 Mar. 1846.

—— “Alphabetic Language for the Chinese disadvantages of their present written character; inconvennience and difficulties of introducing a new language; with remarks on the importance of an alphabetic language, and means of introducing it” C. R. 卷 4:167-172. Aug. 1835.

- “New orthography adopted for representing the sounds of Chinese Characters, by the Roman alphabct, in the national language and in the dialects of canton and Fu-kien” C. R. 卷11:28-44. Jan 1842.
- W. H. Medhurst: 《China: Its State and prospects, with E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Spread of the Gospel》1838, London; John Snow, reprinted in 1973 by Scholarly Resource, Inc. Delaware.
- “A Dictionary of the Hok-Këèn Dialect” 1837. Macao: Honorable East India Company's press.
- “An English and Japanese & Japanese and English Vocabulary” 1830, Batavia。簡介載Chinese Repository卷2:109-111, July 1832.
- “Chinese and English Dictionary” 1843 Batavia, 簡介載Chinese Repository卷12:496-500. Sep 1843.
- “Remarks on the Name of Jesus” Chinese Repository卷12:449-456. Sep 1843.
- George Smith: “The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pby” 1917,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amuel couling: “The Encyclopaedia Sinica” 1917 Shanghai: kelly and Walsh Limited.
- 村上嘉英: 《プロテスタント宣教師の閩南語研究——異民族傳道と言語の問題》1866年3月, 日本文化44:52-72。
- “白話字の變遷と閩南語譯聖書——プロテスタント文書傳道についての覺書” やまさと文化(日本文化)49:96-118。
- “W. H. Medhurst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nguistics” Dec 1965. Tenri Journal of Religion 7: 59-63.
- 平凡社: 《アジア歴史大事典》1982, 東京: 編者出版。
- 佐伯好郎: 《支那基督教の研究4:清時代の支那基督教》1949初版, 1979覆印, 東京: 名著普及社。

矢澤利彦：《中國とキリスト教》1972年3月，東京：近藤出版社。

比屋根安定著：《支那基督教史》1940年3月東京：生活社發行。

溝口靖夫著：《東洋文化史上の基督教》1941年3月，東京理想社出版部。

楊森富編：《中國基督教史》1968年，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1990.6.15